

绪论 蒙古部族与文化 研究述说

一

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我国汉语学界往往以“部落史”指代部族史,这其实是不严谨的,也是不正确的。根据《辞海》的解释,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由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或氏族组成。通常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和宗教习俗,以及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519页)部族则有两种含义:一,在中国汉文历史文献中指历史上的部落、氏族,最初指一个族体(如契丹、氐、羌),后指一个族体内的各部分;二,对俄、德等西方语言中一种社会学术语的译语,指原始社会以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同上)。据此看来,在学术术语中,“部落”是指原始社会组织,而“部族”是指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或其内部分支,在社会性质上与部落不同。因此,部族史包括部落史,但不能等同于部落史。在古代汉文典籍中,将非华夏族群及其分支集团习称某某“部落”,这是儒家文人在“华夷之辨”思想指导下视他们为未开化野蛮人的结果。这种认识和表述影响极深,直到当代,不少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游牧民族的社会史是一部部落史,他们的文化是部落文化;而在很多作家和导演创作的历史小说、影视作品中,北方游牧民族几乎无不例外地被表现为极其野蛮、愚昧、残忍和无秩序的群体,不曾想他们何以轮番统治欧亚大陆至千万年,而且与中原农耕文明始终并存。其实,各游牧族群的部落史并不为华夏人所了解,只有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并和内地王朝发生各种关系后,中原士人才开始对他们略知一二。历史地看,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和文明对华夏文明影响不小,只可惜长期被忽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罢了。

蒙古部族史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部落阶段，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各氏族、部落活动时期；第二是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新部族增生阶段，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蒙古皇室从内地退回草原的一个半世纪；第三是各部重新整合、滋生大小游牧集团阶段，时间大致相当于北元初年到清代各类蒙古旗的建立为止。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各异，历史内容各具特色。元代以后，蒙古的社会组织从千户演变为爱玛、鄂托克，因此北元时期的部族和爱玛、鄂托克之间其实并没有质的区别。

蒙古部落史的源头不见诸记载，一般认为，唐代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东西的室韦各部是蒙古各部的先人。《旧唐书》中第一次记载了“蒙兀室韦”，他们生活在望建河（额尔古纳河）流域。9世纪中叶，随着回鹘汗国的灭亡，蒙兀室韦始入蒙古高原。根据14世纪波斯文史书《史集》记载，蒙古人最初住在额尔古涅昆（昆意为“悬崖”）的陡峭山岭中，后因人口繁衍，住的过于拥挤，于是走出山中，奔向平原。《元朝秘史》开篇就讲，蒙古的始祖为孛儿帖赤那（苍狼）和妻子豁埃马阑勒（白鹿），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之不一儿罕合勒敦山。《史集》与《元朝秘史》记载的两个传说反映了同一时期的同一事件。在外蒙古高原上，蒙古人很快繁衍，形成被称作“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两大体系的大大小的氏族和部落，如蒙古部的孛儿只斤、合塔斤、兀鲁兀、忙兀、泰赤兀、别速、雪你、捏古思、翁吉刺、兀良哈、燕只斤等。此外，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原蒙古人各部，如札刺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外刺人、八儿忽人等以及蒙古化的突厥人，如克烈人、乃蛮人等。这些形形色色的部落和氏族，有的处于原始状态，而有的已经处于文明阶段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民族”状态。

成吉思汗的统一战争，完全改变了蒙古草原的社会性质。1206年，成吉思汗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将全国百姓分为95个千户。原则上，千户是地缘组织，被打败的部落和氏族统统被瓜分到各个千户里，有些千户虽然仍拥有原部落或氏族的旧名，但名存实亡，其构成早已改变。蒙古血缘部落组织完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缘

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再是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而是崭新的地缘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统一体便是蒙古民族共同体。

接下来，蒙古部族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对外战争，西征中亚、西亚，进而扫荡钦察草原和东欧平原，南下灭西夏、金朝、大理国和南宋，征服吐蕃，形成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的“世界征服者”角色，对蒙古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输出大量蒙古人口，他们的后裔消融在当地民族中，有的形成新的族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外族人口来到蒙古地方并蒙古化，形成新的蒙古部族。蒙元时期融入蒙古的著名的外来部族有钦察人、阿速人、康里人、唐兀人等，还有像契丹、女真以及来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的“色目人”等，没有保留原先的名称而蒙古化的人群则数不胜数。蒙元帝国时期的蒙古本土就像一个民族大熔炉，把各色人种带入蒙古，熔合出一个个新的蒙古部族。

1368年，元朝退出中原回到蒙古高原，史称北元。蒙古汗廷游牧化，蒙古各种政治势力、军事组织和游牧人集团兴衰迭起，有的发展壮大，有的分裂甚至消散，还有的相互重新组合。经过大致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整合，在蒙古高原中部形成了六大游牧集团，被称作六大万户或六大兀鲁思，其下面也形成了很多爱玛或鄂托克，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地缘游牧社会集团。同时，在蒙古高原的东部，在元代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的领地上形成了若干万户，在瓦剌（卫拉特）也形成了若干个大的游牧集团。到了17世纪上半叶，蒙古东邻女真人异军突起，建立爱新国（大金），很快形成叫作满洲的民族共同体，征服蒙古各部，继而建立大清国，在蒙古建立扎萨克旗、内属旗和八旗等军政组织。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至18世纪中叶，满洲人征服了东西蒙古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古内部部族的兴亡、更迭的历史极其复杂。北元时期新兴的游牧集团和以往帝国时期蒙古各部是什么关系？北元蒙古各部是怎么形成的？清朝时期蒙古各旗和北元各部关系又如何？已经消亡的部族去到哪里了？新的大小游牧集团又从何而来？这些都是蒙古部族史关注的重大而复杂的课题。

蒙古部族史研究一直是以往蒙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蒙古族源的探讨,可以说是该课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百余年来,帕拉斯、俾丘林、伯希和、内田吟风、白鸟库吉、马长寿、韩儒林、亦邻真等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不同意见,至今莫衷一是。蒙古高原各部的族属问题,比如克烈人、乃蛮人等是蒙古化的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蒙古人,有很大的争论。北元时期蒙古各大万户和鄂托克的组成、他们的名称、他们的演变都是部族史争论激烈的部分。东西方学者同样花费长时间大精力研究这些课题,其中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的《答言汗六万户的起源》《四卫拉特的起源》,和田清的《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宝音德力根的《15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对北元时期蒙古各部和万户的起源与流变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

二

本书上编部族史研究部分共分七章。前三章的内容涉及蒙元时期外来人口形成的三个蒙古部在北元和清代的演变,四至七章探讨北元时期南、北和西蒙古若干部的形成与构造。

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南部有喀喇沁旗和宁城县,辽宁省有喀喇沁左旗(简称喀左),这些旗县在清代为喀喇沁旗左、右、中三旗,因此这里的蒙古人一直自称为“喀喇沁蒙古”。但是,他们不是喀喇沁。真正喀喇沁人的先祖不属于蒙古部落,连操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都不是,他们来自遥远的里海以北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草原,操突厥语。就在蒙元时期,他们被纳入蒙古的“民族大熔炉”,不仅成为一个新的蒙古部族,而且在元代政治史上曾经荣耀繁华。北元时期,喀喇沁人的活动仍有很大的历史影响。但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只给蒙古高原和蒙古民族留下了他们传奇的历史和响亮的名字,自己则被引入到另一个更大的“民族大熔炉”里去了。

阿苏特部的历史和喀喇沁有些类似,而且阿苏特部曾经是喀喇

沁万户的一个组成部分。阿苏特的远祖是古代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今天北高加索地区的奥赛梯人与阿苏特部是近亲。2002年夏天,笔者在撰写《从17世纪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系列论文时,在李保文整理并影印出版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中发现了内容似乎有某种关联的3份文书。这3份文书是典型的“孤文书”,关于它的作者、收信人、时代背景毫无交代,只凭相关知识积累可发现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经笔者仔细研究,发现这3份文书的内容涉及阿苏特部的内部情形和最后去向,因此如获至宝,喜出望外。2003年初,笔者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完成文稿,定名为《阿苏特部的结局》,2月23日从东京寄出稿子,准备在蒙古史论丛《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三集发表。但后来这份手稿经过一校后下落不明,论丛也在这个第三集上夭折了。再后来,在其他论文中发现此文稿主要见解,笔者这才恍然大悟,但还是选择了缄口。在此想说的只是,孤本文书就像一团谜,在其中发现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研究部族史时必备的训练。言归正传。阿苏特在北元时发展壮大,成为草原上一个重要的游牧集团,但17世纪前期满蒙战争中,他们未能保全,最终分流到满洲八旗和蒙古其他部中。

上编第三章探讨的是中亚卫拉特蒙古的一支和硕特蒙古的起源与名称。该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原先是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后裔统治下的部族,统治家族姓孛儿只斤,游牧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他们的远亲是今日分布在内蒙古通辽市和其他盟、市境内的科尔沁蒙古。16、17世纪时,和硕特人十分强盛,牧地扩张到中亚腹地,其首领成为四部卫拉特联盟的盟主,冠以汗号。和硕特部的名称和古代蒙古部族形成的某些特别形式有关,也值得探讨。

第四、五章分别探讨了南部蒙古的东土默特和扎鲁特两部。两部形成的时间都比较晚。扎鲁特部先人在蒙元时期的历史比较模糊,其部名亦尚未得到准确解释。扎鲁特蒙古人现在生活在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市北境,但16世纪却游牧在呼伦贝尔市和蒙古国接壤地区一带的哈拉哈河流域,属于蒙古喀尔喀万户右翼的一个鄂托克。东土默特是一个很“年轻”的部,形成于16世纪末。他们由两部分

人组成,处于统治地位的是蒙古六大万户之一的土默特万户的分支,而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土默特贵族亲家兀良哈家族统治下的百姓。他们从今天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逐渐向南、向东迁徙,从河北省和北京北的交界处一带一直向东移动,最后到了辽宁省阜新、北票、朝阳一带。从这些部族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看到晚近蒙古部族形成的路径和形态。

第六章的内容涉及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人是构成今天蒙古国的主干族群,历史上和扎鲁特蒙古同属于喀尔喀万户。16世纪后半叶开始,喀尔喀万户的右翼向北发展,到清代时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的北部。但是,喀尔喀蒙古在广袤的北蒙古高原上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汗国,而是形成了三个汗部。那么,蒙古各部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和机制维持其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七章《1655年以前的喀尔喀扎萨克》从蒙古社会中的“扎萨克”体制入手,从一个侧面探讨了以上提到的问题。应该指出,这是蒙古部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是使该领域研究得以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蒙古文化遗产丰富,取之不尽,研究没有尽头。蒙古人对文化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自古如此。加之蒙古人国际见识早而广,因此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在蒙元时期,蒙古人除继承历代蒙古高原游牧人所创造的游牧文明的养分外,还吸收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景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儒学的各种文化因素。忽必烈皇帝的母亲是虔诚的景教徒,而皇帝本人和皇后则笃信佛教,蒙古臣子中则有各种宗教信徒。蒙古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化成就有《元朝秘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历史和文学名著,也有古希腊文学作品《亚历山大传》的蒙古帝国时的译本、汉文《孝经》的元代蒙译本、藏文《萨迦格言》的元代译本,还有译自回鹘语的元代佛经和译自藏文的《甘珠尔经》、《丹珠尔经》以及《格斯尔》故事和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等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至于近世以来蒙古的文人和文化

成就更是难以尽述。蒙古的民族文字就有畏吾体蒙古文、八思巴文、索永布文、瓦金达刺文、托忒文、斯拉夫文等多种。除此之外,在语言、艺术、建筑、科技、天文、医学等等广义的文化领域中,蒙古人都做出过卓越的成就。蒙古人对东西文化交流的推动史无前例,这个历史反过来也表现在蒙古文化中。国内外蒙古文化研究成果很多。

然而,本书下编涉及的蒙古文化史内容极其有限,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这里笔者只谈了四方面的内容:第八至十章探讨了16世纪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后的西藏文化影响及其表现,第十一至十四章谈了藏传佛教影响下南、北、西蒙古佛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片段,第十五、十六章考述两位清代蒙古文人的事迹,第十七至十九章关乎畏吾体蒙古文文字遗产及其研究的点滴。

文本是蒙古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文本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手段。蒙古文化史相关文本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突出的要求:一,手抄本是蒙古文本的主要形式,流传至今的蒙古文献大部分是手抄本,而且同一文献往往有多种手抄本,有的甚至具有20种不同版本。这就首先要求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二,蒙古文化史相关文本具有多语种、多文字的特点,因此,其研究要求很高的语言学素养和多种语言知识。三,因为蒙古文化的多元性和交流范围的广泛性,文本研究还要求多种相关异文化的丰富知识。

举一两个例子。

蒙古语文献《十善法白史》是系统阐述蒙古政教二道的著作,因此对文本中出现的ANKA和KILBAR一对词义对立的蒙古语词的解读十分关键。以往国内外学者一直把它解读为enke和kilbar,解释为“和平”与“幸福”的意思。《十善法白史》有20种不同手抄本,在不同版本中KILBAR这词还被替换成了jiq-a或cing。笔者在考察这些词的古近词义和相关藏文词语的基础上,又据蒙古政教并行理论的内涵,最后确认这两个词实际表达的意思是“文”和“武”,因而才正确理解了文本讲述的国政之文武双面和教法之显密二宗。

额尔德尼召主寺所保留蒙古文墨迹,文义不通,晦涩难解。如不了解喀尔喀万户和土默特万户的特殊关系,不了解额尔德尼召建

寺时土默特历史背景,就无法解释该墨迹所含内容。如不了解流行在蒙古地区的佛教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那么蒙古人所说的“五色四藩”就难以理解。还有,如不清楚清朝初年的宗教政策背景和库伦旗历史与内齐托音喇嘛事迹,没有头绪的零星的满文档案可能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最后,如《1431年木刻版畏吾体蒙古文佛经序与跋》一文所展现的那样,如能够利用好语言学手段,从几百年前的已经发黄的文本中我们或许还能够微微听到古人发出的声音。这就是文本的魅力和活力所在!

上 编

蒙古部族史研究

第一章 喀喇沁的起源与名称

今天提起“喀喇沁”一名,人们立即就会想到清代的喀喇沁三旗,甚至只会想到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喀喇沁旗。其实,今天的喀喇沁旗的喀喇沁蒙古人只是古老而庞杂的喀喇沁人集团的一小分支而已。

喀喇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蒙古西征时期的高加索地区的钦察人。元代,喀喇沁的先人是皇帝的怯薛军队及其家属。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之间,喀喇沁为庞大的蒙古游牧集团,15世纪中期以后归入应绍卜万户。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后,在原蒙古六万户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接统治,达延汗三子巴儿速孛罗后裔成为应绍卜万户的统治家族。16世纪后半期,喀喇沁万户逐渐取代了应绍卜万户的地位和名称。喀喇沁万户的统治者们向东发展,使兴安岭南部(山阳)的兀良哈蒙古成为其属部,与其统治家族兀良哈氏结为姻亲,形成喀喇沁台吉与兀良哈塔布囊的所谓“山阳台吉—塔布囊”体系。1627年,察哈尔林丹汗西征,征服了右翼蒙古诸兀鲁思。1628年,喀喇沁万户解体。巴儿速孛罗后人统治下的喀喇沁本部与女真—满洲人的爱新国结盟,万户其他成员或归降爱新国,或逃散。1635年,满洲人正式把喀喇沁本部并入爱新国,分隶蒙古八旗,他们不再被称作喀喇沁人了。原喀喇沁属部的兀良哈蒙古人(时已改称喀喇沁)则被编立扎萨克旗,后来发展成为三个喀喇沁旗。如此,喀喇沁一名被兀良哈人保留至今。下面,就喀喇沁人的起源与名称的由来做一考述。

“喀喇沁”一名,源于元代的“哈刺赤”。“哈刺赤”与蒙元时期的钦察人和钦察卫有着密切的关系。

钦察人,原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钦察”(Kıpçak)一名,源于中世纪伊朗语。Kip,意为“红色”或“浅色”;Çak,是对所有草原居民的统称。所以,“钦察”意即“浅肤色的草原居民”。钦察人还曾

被称作“库曼人”，该名来自位于高加索的库曼河。他们是一个伊朗—突厥混合民族。7世纪的时候，钦察人被突厥人所逐，向西迁徙。11世纪中期定居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草原地带。他们曾多次与基辅俄罗斯进行战争，钦察人的一部分留居东方，12世纪中期始建花剌子模王国。

蒙古与钦察人的交往，始于13世纪初。据《蒙古秘史》载，鼠儿年（1204）铁木真大败蔑儿乞惕人，在撒阿里旷野掳获其部众。蔑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别乞与其子忽都、赤刺温等逃脱。铁木真跟踪追击，直到阿尔泰山。次年，铁木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打败了蔑儿乞惕残余部队，脱黑脱阿别乞被杀，忽都等三个儿子经过康里，逃到了钦察。^①该书又载，1205年，铁木真令速不台乘铁车穷追忽都等。铁木真说：“他们如果变成鸟飞上天去，速不台，你要变成海青飞起去捉捕；他们如果变成旱獭钻进地里，[速不台，]你要变成铁锹刨挖去擒拿；他们如果变成鱼儿到了海中，速不台，你要变成网罗去捞获。”^②该书第236节记载：“速不台携铁车，追击蔑儿乞惕脱黑脱阿之子忽都、赤刺温等，追至垂[河]，[把他们]灭亡后回来了”。^③第262节载，1216年又命速不台远征康里、钦察等十一国，渡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直到基辅。^④

速不台征蔑儿乞惕和钦察事，在《元史·速不台传》里也有记载。1216年，成吉思汗遣速不台率兵歼蔑儿乞惕残余。1219年，速不台在蟾河与蔑儿乞惕交战，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奔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⑤1223年，速不台再征钦察，擒获其酋长玉里吉之子，“余众悉降，遂收其境。”^⑥

《蒙古秘史》所记忽都，就是《速不台传》所称的霍都。垂河即蟾

① 《元朝秘史》，四部丛刊本，第197—198节。另参考亦邻真《〈蒙古秘史〉回鹘体蒙古文复原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元朝秘史》，第199节。

③ 同上，第236节。

④ 同上，第262节。

⑤ 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975—2976页。

⑥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第2976页。

河。可见,钦察人因收留了成吉思汗的夙敌蔑儿乞惕人头目忽都,遭到了蒙古大军的征伐。13世纪20、30年代,钦察人被蒙古征服。据“句容郡王世绩碑”载,铁木真为了索要火都(即忽都),征讨了钦察人。在窝阔台汗时期,1237(丁酉)年,钦察首领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归附蒙古帝国。后来,蒙哥又受命率师征伐钦察,终使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来归”。^①据西方文献记载,钦察人的一部分在其库灿汗(1202—1241)的率领下,于1239年逃亡到匈牙利。

蒙古征服钦察后,其首领班都察率部分钦察军队随蒙古军征战。先在攻克阿速首府麦怯斯时立功,后又率钦察百人随忽必烈征大理,伐宋朝,“以强勇称”。

班都察子土土哈武勇善战,屡立战功。1277年(至元十四年),诸王脱脱木、失烈吉发动叛乱,土土哈率兵讨伐,夺回被掠皇祖大帐并寇抄诸部。次年,奉命率钦察骑兵千人,从伯颜大军北征,败失烈吉党羽于阿尔泰山,立大功。因此,忽必烈皇帝下令“钦察人为民户及隶诸王者,别籍之户,户给钞两千贯,岁赐粟帛,选其材勇,以备禁卫”。^②这就是说,被带到蒙古地区的钦察人,不论其身份,全部另编为籍,交土土哈管辖,并选其精锐编成了宿卫军。1286年,正式设立钦察亲卫军,以土土哈为都指挥使,“听以族人将吏备官属”,^③成为元朝侍卫亲军的主力之一。

钦察首领归附蒙古后,还世代掌管元朝皇室的马群。据《元史》记载,土土哈之父班都察“尝侍左右,掌上方马畜,岁时拥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④因此,班都察之属钦察人还被称作“哈刺赤”。这些哈刺赤牧户分别隶属太仆寺下皇家牧场,在全国共有14处,但主要集中在大都、上都、玉你伯牙和折连怯呆儿一带。“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每逢太庙祭祀、驾仗及宫人出入,哈刺赤牧户都要为其提供乳酪及马匹。

① 苏天爵:《元文类》卷二六,世界书局影印本,1967年,叶7b—叶8a。

② 《元文类》卷二六,叶9a。

③ 同上。

④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第3132页。

皇帝及诸王百官到上都,各立“取乳室”,饮用马乳。回上都时,太仆卿遣使征集乳马到京师后,“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日酿黑马乳以奉玉食,谓之细乳”。

自诸王以下则供“粗乳”。^①可见,“哈刺赤”一名源于酿造黑马乳的职业。黑马乳还称作“细乳”。这些人,无论是在朝廷为卿大夫者,还是在官牧场牧马的,都被叫作“哈刺赤”。显然,哈刺赤一名不是蒙元时期牧马人之统称,而是由酿制细乳者的专业名称变成了钦察牧户的别称,由此又变成了其他官牧场牧马人的泛称。须知,只有“大印子马”群的牧人才称为“哈刺赤”。土土哈家族历代兼任太仆寺要职,管理着哈刺赤牧户。

因为在元朝的钦察人得名为“哈刺赤”,其军队也随之被称为“哈刺赤军”。哈刺赤军的精锐被编为元廷的钦察卫,世代由土土哈家族掌控。哈刺赤军队则驻防在漠北地区,仍归土土哈家族管辖。到了1291年,经土土哈奏请,这支军队发展到了一万人的规模。^②当然,哈刺赤军并非清一色的钦察人,而是包括多民族成分,只有其各级军官多为钦察人。

土土哈和床木儿父子,率领哈刺赤军,为元廷屡建战功。在1277年和1278年平定失烈吉之战以后,土土哈于1286年在阿尔泰山御击叛乱诸王海都,1287年征叛乱宗王乃颜。1288年,败叛王哈丹,尽得辽左诸部。1289年,土土哈从皇孙晋王征海都,在杭海之役立大功。战后元廷论功行赏,忽必烈欲先钦察之士,土土哈谦让,忽必烈说:“尔勿饰让,蒙古人诚居汝右,力战岂在汝右耶?”1292年,在阿尔泰山获海都之众三千户,并奉命进取乞里吉思。1293年,取乞里吉思,复败海都于欠河。1297年,土土哈死,其子床木儿袭父职,领征北诸军逾阿尔泰山,攻巴邻,立奇功。

武宗领军漠北,“军事必咨于床木儿”。1301年,床木儿大败海都于阿尔泰山,重创叛王都哇于兀儿秃地方,“都哇之兵几尽”。成宗夸奖他道:“自卿在边,累建大功,事迹昭著,周饰卿身以兼金,犹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第2553—2554页。

②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第3134页。

不足以尽朕意。”^①1306年,成宗崩,床木儿迎海山即帝位,被封为句容郡王。在仁宗时期,1314年,败叛王也先不花军,次年,又败也先不花所遣将军也不干等,又进军铁门关,胜利而归。^②

1322年,床木儿死。其子燕铁木儿为答剌罕、太师、右丞相、太平王;撒敦为左丞相;答里袭封父爵为句容郡王,驻守漠北。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在燕铁木儿死后,其子唐其势不满伯颜专政,说“天下本我家天下”,谋乱伏诛。^③

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土土哈祖孙三代在元代历史上扮演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重要角色,在元廷的政治、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显赫,是因为在内把持着钦察卫,在外控制着哈刺赤军。至1322年,因为钦察卫兵非常多,为千户者凡三十五,所以分成左右二卫。到了1329年,又分出龙翊卫,三卫同归燕铁木儿统辖。^④漠北哈刺赤军则一直被土土哈家族掌握,迟至1335年,仍在燕铁木儿之弟答里手中。^⑤

1368年元朝灭亡后,元惠宗脱欢帖木儿北撤到蒙古草原。到了14世纪之后,元代的一些宿卫亲军和一些官机构的名称作为蒙古人游牧集团的名称,重新出现在蒙汉史书中。后面将要提到的阿速特部和应绍卜部就是一例。15世纪初出现在明人记载里的“哈刺陈”,则是前面讨论的“哈刺赤”,也就是说,是来自元代驻防漠北的哈刺赤军。元朝灭亡后,哈刺赤军和与之相关的哈刺赤牧户变成了强大的部族集团,但原钦察卫退到漠北以后,是否也和哈刺赤军合流,因为史料欠缺,无从考证。总之,“哈刺赤”被称作“哈刺陈”,或作“哈刺嗔”、“呵刺嗔”、“哈刺庆”、“喀喇沁”等等,均为“哈刺赤”一词的

① 《元文类》卷二六,叶13a。

②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第3137—3138页。

③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第3138页;卷一三三至一三八,第3236—3334页。

④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第3331页。

⑤ 曹永年:《关于喀喇沁的变迁》,《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复数形式的不同汉字音写形式。

这里有必要对“哈刺赤”的词义做一考辨。

关于“哈刺赤”的词义,国内外学者一直意见大体一致,都训为“酿黑马乳者”,蒙古语形式为 Qarači。1993 年,曹永年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哈刺赤”即“兀刺赤”,意为“牧马人”。

曹永年引用宋人彭大雅和徐霆的《黑鞑事略》“其马”条记载的“牧者谓之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便断言“兀刺赤即哈刺赤”。至于为什么,曹永年没有做解释。接着他又引用了《元史》“兵三:马政”里的“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的记载,得出了“遍布全国之群马所的牧人均名哈赤、哈刺赤,显然,哈刺赤一名在蒙元时期本是牧马人之统称”的结论。^①很明显,曹永年的结论是依据这样一种推论:牧者=兀刺赤,牧人=哈刺赤,牧者=牧人,因此,兀刺赤=哈刺赤。然而,简单地运用这类等式恰恰是民族语文学的最大忌讳。

《元史》“兵三:马政”记载的“哈刺赤”到底指什么人?据该书记载,1263 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群牧所,隶太府监,后逐渐升为太仆院。院废,立太仆寺,先隶宣徽院,后又改隶中书省。其职责是“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马”,即皇帝和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马。这类马群的马,左股烙以官印,号称“大印子马”。这类马群的牧马人叫作“哈赤、哈刺赤”。^②也就是说,太仆寺管辖的马群不是一般民间马群,而是皇家马场的马群,即所谓的“大印子马”群,只有牧放这类马群的人才叫“哈刺赤”。他们是皇家马场的牧马人。蒙古的一般牧马人通称为“阿都赤”,在“哈刺赤”一名出现之前如此,出现之后仍是如此,这在《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等许多文献中有足够的证据,兹不一一列举。

“哈刺赤”之名,来源于酿造黑马乳或被称作“细乳”的钦察人的职业。前引《土土哈传》载,班都察“掌上方马畜,岁时拥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句容郡王世绩碑》也

① 曹永年:《关于喀喇沁的变迁》,1993 年。

②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第 2553—2554 页。

记载,“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种人以强勇见信,用掌畜牧之事,奉马湏以供玉食,马湏尚黑者,国人谓黑为哈刺,故别号其人哈刺赤”。^①当时亲自喝过宫廷黑马乳的徐霆写道:“初到金帐,鞑主饮以马奶,色清而味甜,与寻常色白而浊,味酸而膻者大不同,名曰黑马奶,盖清则似黑。……玉食之奉如此。”^②“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清则似黑”,道出了“哈刺”一词的真正含义。该词除了“黑”,还有“清”的意思,自古到今,一向如此。可举“哈刺乌苏”(Qar-a usu,清水)、“哈刺阿刺吉”(Qar-a ariki,白酒)、“哈刺兀都儿”(Qar-a edür,白天、清日)等等很多例子,都没有“黑”的意思,而应训为“清”。“哈刺赤”就是管清色马乳(即所谓的细乳)的人,原来是酿造这种马乳的钦察人的别称。所以,只有哈刺赤才有“在朝为卿大夫者”,一般“阿都赤”是不可能的。皇家牧场的牧马人统被称作“哈刺赤”,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哈刺赤人——钦察人掌管着“上方马畜”,即皇家马群。

那么,兀刺赤和哈刺赤是否是同一个词?答案是否定的。

先看“兀刺赤”的词义。在《蒙古秘史》中,该词共出现五次,前四次以“兀刺阿臣”的形式出现,旁译为“马夫”,最后一次以“兀刺赤泥”形式出现,旁译为“马夫行”,即“马夫”的宾格。据方龄贵考证,“兀刺赤”在《元典章》中近二十见,^③均指用铺马迎送乘驿的人,即驿夫。在明朝时期的史书和辞书中,对“兀刺赤”也有解释。《元史·兵志二》“宿卫”：“典车马者,曰兀刺赤、莫伦赤。”^④《华夷译语》“人物门”：“马夫,兀刺赤。”^⑤可见,“兀刺赤”是管理铺马、司驿站的人。

但是,前引《黑鞑事略》在谈到蒙古马群时说,“牧者谓之兀刺

① 《元文类》卷二六,第14a页。

②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34页。

③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④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第2524页。

⑤ 《华夷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另参考《元史语解》,皇子门:“乌拉齐,驿站人也。”职官门:“乌拉齐,司驿站人也。”乌拉齐即兀刺赤。